

#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经济学编辑特色

卫 玲

(西北大学 学报编辑部, 陕西 西安 710069)

**摘 要:** 对《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这一西方新教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第一种用汉文出版的综合性时事半月刊的经济学编辑特色进行探讨,指出它具有为中西通商服务的明确编辑方针,是最早向中国介绍跨国公司这种企业组织形式的刊物,采用简洁明了的表格形式刊载出口商品信息和以中国传统的章回故事体介绍经济学知识和通商信息等独具特色的经济学期刊编辑方法,并且鲜明地提出自由贸易、万国通商、以商科农等主张。

**关键词:**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 中西通商; 经济学编辑特色

**中图分类号:** G 239.29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8 - 6927(2005)04 - 0096 - 04

## The editing characteristics in terms of economics of the Eastern & Western Monthly

WEI Ling

(The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the Journal of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China)

**Abstract:** By studying the editing characteristics in terms of economics of the *Eastern & Western Monthly*, a comprehensive news monthly published in Chinese by the western commissioners in China, the paper points out the editing policy of the journal is to serve the Western-Eastern Commercial exchange and introduce the western multi-national cooperations to China. The monthly also boasts some economics-oriented journals' editing method of introducing economic knowledge and commercial exchange information. The monthly also forwards some suggestions of free economic trade, multi-national trade by using commerce to compensate agriculture. Therefore, it is the first specialized journal with a detailed information about sino-western trade.

**Key words:** Sino-western trade; edit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conomics-oriented journals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Eastern Western Monthly Magazine), 简称《东西洋考》,道光十三年(1833)创刊于广州,为西方新教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第一种用汉文出版的世俗月刊。该刊继承了欧洲的新闻传统和办刊模式,在当时古老而封建的中国引入了一种新的文化传播载体。它采用开设专栏、分类编纂的方法,辟设“史记”、“地理”、“贸易”、“新闻”等栏目,内容涉及宗教、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学、风俗、时事等各个门类。它一方面是西方传教士传教布道,维护在华洋人利益的工具,另一方面成为中国人了解西方的窗口,像魏源、徐继畲等一些“睁眼看世

界”的先进中国人便从中汲取新知。

作为综合性的时事月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专门辟设了经济贸易方面的专栏,以独特的编辑手法编辑刊登了一些有关国内经济及对外贸易的文章,拓展了中文著述的新领域。

### 一、为中西通商服务的明确编辑方针

#### (一) 提出自由贸易理论

丁酉年(1837年)十二月号的《东西洋考》在篇首发表《通商》一文,旗帜鲜明地提出重商主义(Mercantilism)的自由贸易论说,阐述了对外贸易对一国经济

收稿日期: 2005 - 06 - 15

作者简介: 卫 玲(1970 - ),女,陕西西安人,副编审,博士,从事经济管理与编辑出版研究。

发展的重要性。该文在主张自由贸易的同时,提出了禁商和纵商与国运隆盛和邦家兴旺的关系。这就是:“禁止通商,如水底捞月矣,故明君治国,必竭力尽心,以务广其通商也”;“且国而禁其买卖,民成蛮狄矣,使有愿治之君,教化庶民,而不开其通商之道,以广其财源之路,欲其国之攸宁者,是犹缘木以求鱼者也”;“国有约束之条,则通商者难,……约束严而征税必重,则富户之贾,不敢出大本钱,恐易涉于嫌疑”;“惟容商贾任意而贸易,此之谓放纵也,薄其税敛,开口准商船赴诸埠头,不专设洋行,而允各人买卖,任其自主以经营也……故此诸邦准由商人自主赴市交易,生意繁盛,而国家亦长享太平之福,而兴旺焉”。这是在160多年前第一次向中国系统地介绍自由贸易理论。虽说

这也许是英国殖民者恃坚船利炮强压龙头下海饮水的序言,但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全新的理论。

## (二)主张万国友然相交,相为贸易

当时西欧盛行的重商主义理论认为:除了开采银矿藏之外,只有对外贸易才是货币财富的真正源泉,国内贸易虽有一定益处,但却不能增加国内的货币量,只有进行对外贸易才能使一国的货币财富增多,从而使国家富裕起来。正如文中所述“各国之民,相为贸易”,“万国友然相交,四海之内为兄弟也。不但国与民咸有所益,且足以昭其善治,而播风声于异国焉。”<sup>[1]</sup>文章还举述了清、英、法、美列国对外贸易总额的大致情况(见表1)。

表1 《东西洋考》所列清道光年间四国进出口贸易货价总额

国名	年份	入银/万元	出银/万元	商船数/只	出入银总额/万元
大清国(中国)	道光年间	—	—	—	—
英吉利国(英国)	道光十七年(1837年)	17 700	25 500	23 000	44 200
法兰西(法国)	道光四年(1824年)	9 090	9 000	300	18 090
亚墨哩加国(美国)	道光九年(1829年)	7 400	7 200	—	14 600

对于表1的统计结果,《东西洋考》指出:“虽是说其大略,而所著者有凭据,看者不信,且论五十年前,其贸易少,今船快驶,国王不禁,其交易是以月益年增也。如此日久成多,一百年后可加之三倍矣。”<sup>[1]</sup>这是在期刊发表的中国与英、法、美等国最早以银元为计算单位的进出口贸易比较表,它以数字简明地支持了编者“万国友然相交”、“相为贸易”的主张,也使当时的中国人了解到了大清贸易不振,进出口贸易总额仅约为英国1/15的事实。

## (三)主张以商补农,“均齐方正”

《通商》一文还反驳了“以商废农”和“载出纹银”的说法,指出“苟其国各有余缺,而所缺者不入,民人乏用。所余者不出,土产无价,农夫亦何由得乎。故必开通商之道,以助余补不足,令各均齐方正,使百姓出作入息,皆击壤而歌。若有人说以商废农,呜呼,何其说之谬哉。”银罕价高遂入口,银丰价低遂载出,此天下之理,律例所不可禁焉。<sup>[1]</sup>由于在当时的经济生活中,商业资本占有重要地位,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还不是生产支配流通,而是流通支配生产,因而社会财富被认为是流通过程带来的,一个国家社会财富的增加是对外贸易带来的。《通商》篇断言:“惟国而通商则裕,不通商则穷也。”这些言论对于以农立国且长期闭关自守的中国来说,无疑又是新说新论。

## (四)主张中国大兴“内地贸易”和“外国交易”

在内地贸易方面,《东西洋考》指出:“内地之贸易,结四海为一家,友道于是乎立,利路于是乎通。国之民人各方通商,则化昭文明,而流教泽矣,利身利国,为醇朴矣。”<sup>[2]</sup>道光戊戌年(1838年)正月号所载的《贸易》一文,详细分析中国十八省形势,认为其“水土之风气、山海之产物迥别,各省自然有交易之理矣。……内地互相贸易,大关于国家,紧要于百姓”。该文还以福建等沿海省份和云南、贵州、广西等“远遥地方”为例,指出这些省份不能“禁运”,不能“设塞运营货物之路”,要开辟“运出之路”,“易别省之产物,自然而相丰厚宽裕”。其中,尤其是广州、潮州、厦门、泉州、福州、宁波、乍浦、杭州、上海、胶州、登州、天津、锦州等“天下至广大之埠头,更应“互相市易”、“运货往来”。

在论及外国交易的起源时,《东西洋考》指出:由于“各国之土产殊异,中国出茶叶、胡丝、桂皮、樟脑等货甚盛,南国出燕窝、海参、苏木、丁香、胡椒、米等货,西国出金、银、锡、铁、各项羽毛、大呢、洋布、时辰表等货,搜国之根,寻邦之衅,察其形,观其势,就知各国有所缺,又各国有所丰也,也是外国交易自然而起矣。”<sup>[2]</sup>《东西洋考》认为“开广通商,内外两相有矣”,“与外国互相贸易,其益无穷”,“不论买卖何物,内外彼此获益”,“民殷,国富,闾阎丰裕,不亦悦乎”。由此,该刊主张“宇宙内万民为一家”,“合四海为一家,

联万姓为一体”,人类“要往来接济,以满其需用”。其实,这已不仅限于主张中国大兴与外国的交易,简直就是描绘全球贸易的远景。

## 二、最早向中国介绍跨国公司这种企业组织形式

该刊戊戌年(1838)年九月刊出的《公班衙》一文,最早向中国介绍了西方早期的公司这种企业组织形式,亦即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办事处及荷兰东印度公司吧城(雅加达)办事处的组织形式。其中的“公班衙”也是英文 Company 及法文 Compagnie 最早的期刊汉译。但是,《东西洋考》也常常使用“公司”一词。

《公班衙》一文实际上反映了坚船利炮下的一部贸易战争史。它从3方面介绍了公班衙的发展史:一是介绍其历史由来,表明它最早为荷兰国所创,起初在葡萄牙人独霸海上时,商人们为免商船被劫,而捐资集股,并备船载炮募兵东来,运回之货再分给各集资者,以分其利,这就是公班衙的雏形,荷兰公班衙最初的“签题之银”(注册资金)为250万元;二是介绍英国取代荷兰公班衙的历史过程,由于荷兰公班衙生意大增,“每年所捐之银奉本地国家十五万元焉,另纳一百万元以答国恩”<sup>[2]</sup>,需要上岸买地开新埠,故因夺地而开战,曾两攻澳门皆败,又与郑成功相持于台湾,亦败降,清嘉庆年间(1796—1820)又战败于英国,遂解散公司,所占新地皆归英总督所有;三是介绍英国公班衙的兴起。早在1573年至1619年间,英国即派船与印度通商,在与荷兰的战争中逐渐形成英国各公司的“密合防御”,积累本钱800万元,1600年五印度成立公班衙(即东印度公司),设总督,渐斩控制了印度大半大权,又与法兰西、印度地方军交战,“英公班衙官员妥筹防堵,堆积军需,保障封疆也”。但“所获之国广,不可贸易,治国而已”,遂有东印度公司向我国广东的扩展,即驻广州公班衙之设,到1838年时,已“藏国帑之银共计一万五千万元”<sup>[3]</sup>。这些内容分别涉及了跨国公班衙组织的来由、组织机构与殖民者政商合一的管理方式、损资集股方式、本金的积累、贸易方式、经营等的大致情况。这显然是鸦片战争前夕的中国人知之甚少或所知极不系统的经济组织形式。而在广州开设公班衙,又使中国人在家门口领略和目睹了这种组织形式的具体运作。

清初,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到广州贸易时,尚未设立公班衙,船上管货的货长上岸交易后仍随原船返航。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始设机构,公司派货长12人常驻广州办事,由其中高级人员三四人组成

管理委员会,处理英国对华全部商务及交涉事宜。至清道光十三年(1833年),因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独占权取消而停业,于道光十九年(1839年)结束。其组织中的大班(英文 Supercargo),即外国商船中管货和处理商务的货长及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办事处管理委员会委员(货长出身),依其职位高低,分别称为大班、二班、三班。五口通商后,广州、上海等通商口岸外国洋行的外籍经理,亦俗称大班。

《东西洋考》对公班衙作了多角度介绍和报道。道光甲午年(1834年)三月号“新闻”栏内,报道是月十四日“英吉利国东地公司贸易之事已经完结,……自今以后其公班衙不准再办贸易之事,只可辖理在印度等处各属地方,治其兵民而已。且英人在中国贸易之事既非公司所理,因奉大英国上谕,特派三位监督驻粤,督理事务”。道光甲午年(1834年)四月号“新闻”栏内,报道是月英国派水师提督罗拿碧侯爵抵粤就任监督,驻粤公班衙大班、二班充任副监督,管理英国商船人等,而物价、卸货等则由船主自理。另外,还报道了公班衙前任大班马治平在道光十三年(1833年)十二月在美国去世的消息。

道光戊戌年(1838年)三月号刊出的英公班衙于道光十七年(1837年)八月十九日公示的《公班衙晓谕地坵契纸》,反映了公班衙与所在国地方的土地买卖契约方式,包括地租、地价、使用期限、公物律之人(似为律师的责任等)。

此外,道光戊戌年(1838年)八月号述及远商“贸易险中做”,有“保举会”进行担保,并介绍了“保举会”对商务、房屋、人寿等的担保办法。这些同现代保险公司的经营范围基本一致。从文中“此保举火之会西国遍处已立也”。不难看出,100多年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保险业已相当发达了。

《东西洋考》对跨国公司这种企业组织形式和经营形式向中国读者所做的首次系统介绍,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无疑是一件新鲜事物,虽然其目的也是为英商服务,但这些闻所未闻的新事物肯定对鸦片战争前后中国人“睁眼看世界”和发展民族经济会有所启迪。

## 三、独具特色的经济学期刊编辑方法

(一)以简洁明了的表格形式刊载出口商品信息

表格简称为表,是记录数据或事物分类的一种有效表达方式。它与插图的作用有异曲同工之妙,均可代替或补充文字的叙述,具有简洁、清晰、准确和一目了然的特点,同时其逻辑性和对比性又很强,是现代期刊常用的信息载体形式和编辑手段,而将这一形式

首先用于中文期刊的当属《东西洋考》。

从甲午年(1834年)正月至五月,《东西洋考》特设《市价篇》,采用表格的形式详细报道“省城洋商与各国远商相交买卖各货现时市价”,分为“入口的货”和“出口的货”,包括的商品种类十分丰富。“入口的货”既有海参、燕窝、鱼翅等食品,又有棉花、洋布等纺织品,更有象牙、貂皮、狐狸皮等名贵特产和铜、白铅、马口铁、番锡等金属。“出口的货”中,有八角、桂皮等香料,大黄、土茯苓等中药材,而且把当时出口茶叶的各种品种均在表中一一示明,如工夫茶、白毫茶、熙春茶、雨前茶、屯溪茶、上香茶等。市价表中详细列出了每种商品每担的售价,这无疑是最早的中文对外贸易行情表。

18—19世纪,随着欧洲工业革命的爆发和工业制品的大量生产,日益增多的工业制成品(如纺织品)及与之相适应的工业原料(如棉花)便进入了世界市场。因而在《市价篇》“入口的货”中列出了包括棉花、洋布、花布、架纱布、上幼洋布、棉纱、大呢、羽纱等的价格;在“出口的货”中列出了包括赤布、苏蓝布、土蓝布等的价格。根据这些市价表,我们可以较详细地了解当时广州进出口商品的种类,直观地比较其价格变化。正如《市价篇》篇末所云:“在右各货市价乃系远客愿以此好法教与中华。初起此市价明篇,但不能得全宝玉成,举其大概,看官请勿见怪其错也。”这些市价表对于研究当时的中外贸易及我国近代对外贸易史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 (二)以中国传统的章回故事体介绍经济学知识和通商信息

章回小说体是我国古代长篇小说的主要形式。其特点是分回标目,故事连接,段落整齐。宋人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已具其雏形,明清两代的章回体长篇小说已较普遍。清嘉庆二十年七月初一日(1815年8月5日)创刊于马六甲的中文期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已运用这种文体表现宗教故事。《东西洋考》最早将这种文体用于经济学论著的编写。具有这种文体雏形的、刊载于《东西洋考》道光戊戌年(1838年)二月号的《贸易》一文,主人公为厦门富商林兴,该文虽未使用“且听下回分解”的字眼,但其故事性还是很强的。道光戊戌年(1838年)四月号《贸易》一文中的“曾相公”和道光戊戌年(1838年)五月号《贸易论》一文中的“曾相公”显然已相联系,五月号和六月号、七月号的《贸易论》和《贸易》文末也有了“不知后来如

何,只看下月传分解”的字眼。两文中还有诸如“话说相公”、“且说曾相公”、“忽一日”、“三人谈来讲去半时,各人拜别而归”等记叙故事的用语。其中较巧妙的是道光戊戌年(1838年)五月号的《贸易论》,为了表现英、美等国进出口贸易的具体货名和估价银等枯燥数据而虚构了“话说曾相公正在省城,有一个洋商请他饮茶”、“洋商拿一张单,交曾相公看一看,内开一条货单,如左……”,以及“且说曾相公览毕,就吃大惊”等情节,生动有趣地罗列了英国进出口大呢、羽毛、哔叽、洋布、棉纱几十项交易的具体数据。这样,附会于中国传统文体而表现贸易内容,无疑会使期刊拥有更多的中国读者。

除此之外,《东西洋考》还运用了“中国格言”、故事、书信、对话、问答等多种文体阐述贸易、通商、经济学说等,尽力贴近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灵活的编辑方式和特色。

总之,《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作为在中国境内创办的第1份中文期刊,而且又由英国传教士编辑出版于我国近世第一个通商口岸——广州,加之其丰富的通商、贸易、经济学内容和主要为东西洋通商而办刊的宗旨。因此,说它是中国第一份有关中西贸易的专门杂志并不过分和偏颇。其实,其中有关宗教、历史、文学、地理、天文、农业、技术的内容,也主要是为通商这个总的办刊宗旨服务的。虽然,诸如提出明确的办刊宗旨、编辑方针、提出自由贸易、主张万国通商、主张中国大兴内外贸易、向中国介绍跨国公司、用表格表现价格行情、用章回、故事、格言、对话、书信这些文体来表现经济学内容等等,在今天看来都是些极为普通的方法,但它毕竟是在19世纪30年代中国尚为睡狮时出现的,是在中国传统历史分期的古代、近代史的“分水岭”上出现的,无论出于什么目的,其首创之功不可埋没。

## 参考文献:

- [1] 编者.通商[J].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丁酉年(1837年)十二月号,160-162.
- [2] 编者.贸易[J].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戊戌年(1838年)正月号,8-11.
- [3] 编者.公班衙[J].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戊戌年(1838年)九月号,419-420.

(编辑:刘雪春)